

杨中州



杨虎城将军 纪事

河南人民出版社

引以爲身殉葬，
志在千秋，
岳飛、文天祥、
戴名世、瞿秋白、
方志敏、鄧演達、
楊虎城、聞一多、
諸輩，以身殉
國，不亦偉乎！

毛澤東讀《唐宋書·徐有功傳》批注呼迹：“岳飛、文天祥、曾靖、
戴名世、瞿秋白、方志敏、鄧演達、楊虎城、聞一多諸輩，以身殉
志，不亦偉乎！”

楊虎城將軍遺詩

『去年號國贈羔裘，今日羅衫此地游。
荏苒光陰快似箭，干戈抗攘
几時休？』

啓功書

去年號國贈羔裘，今日羅衫此地游。
荏苒光陰快似箭，干戈抗攘
幾時休。

丙寅仲夏養痾中州會館遇張君
天昂感懷舊事賦詩贈之

楊虎城將軍遺詩將軍誕辰一百周年 啓功敬書

前 言

今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是“千古功臣”民族英雄”杨虎城将军一百周年诞辰。杨虎城将军是“有功于国家民族”的杰出爱国将领，他的爱国主义精神有着特殊绚丽的光彩，具有感人肺腑的力量。他从小饭铺里的童工到统帅千军万马的将军，从护国、护法到坚持靖国军旗帜“保持革命人格”，从坚守古城西安到东出潼关参加北伐战争，从重用共产党人到发动西安事变，从归国抗日到惨遭杀害，处处洋溢着大无畏的自我牺牲精神和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

米鹤都指出：杨虎城将军出生于陕西省蒲城县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从他懂事时起，他所看到的就是清政府的腐朽专制和旧中国的疮痍黑暗。特别在其父因遭陷害被清政府所杀之后，十五岁的他便被迫挑起赡养母弟的重

担，在生死线上挣扎煎熬。这使他更直接地感受到社会的不平等和不合理，在他的心灵中激起了反抗压迫的意识和变革社会的强烈要求。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杨虎城立即带领一批志同道合的青年农民投入了革命的队伍，希冀通过这场革命变革社会、改变命运。但是，辛亥革命并未能触动中国农村的经济结构，当杨虎城一九一三年退伍还乡后，所面临的依旧是租税如狼、苛政似虎的严酷现实。于是，他率领农民起而反抗，并在一次抗租斗争中打死了下乡逼租的一方恶霸，从此走上劫富济贫、武装抗暴的道路。这时期杨虎城并未超脱中国历代农民朴素的平均主义思想的局限，如果历史倒退一百年，他很可能会成为一个“替天行道”的梁山泊式的好汉。但是，二十世纪中国势在必行的民族民主革命的伟大社会变革，却把他推上了接受现代进步思想、登上社会政治舞台的道路。

一九一六年袁世凯盗国称帝，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发起讨袁，杨虎城率其部下起而响应，

随之又投入护法战争。他的部队逐渐成为与北洋政府对抗的陕西靖国军中的一支劲旅。这一过程中，他广泛地结识了陕西著名的革命党人和进步知识分子，也更多地接触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开始把辛亥革命时对三民主义一知半解的直观认识逐步上升到理性认识，成为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奉者。

他这种信仰的笃实，很快就得到了验证。一九二二年，在北洋军阀强大的军事压力和政治收买的夹攻下，陕西靖国军的众多将领纷纷接受了敌人的收编，驻三原县的靖国军总司令部的牌子也被人取下。唯有杨虎城严拒各种劝降，并派人到三原将靖国军总司令于右任迎至武功，宣称：“要保全革命人格，要坚持靖国军大旗不倒”。他带领几千人马左冲右杀，取得了多次胜利，遥应广东的革命政府。然而，在北洋军阀重兵围攻下，不久杨部遭受重创，不得不撤往陕北，以求保存革命火种。此时，适逢陈炯明叛变，孙中山先生苦心经营的广东革命政府也毁于一旦。面对革命道路的种种挫折

和失败，杨虎城思想上十分苦闷，反求诸己，对于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问题却百思不得其解。

一九二三年春，他在陕北榆林蜚居期间结识了陕西著名的进步人士杜斌丞，并通过杜与中共陕西党组织的创建人魏野畴建立起真挚的友谊。他们一见如故，过从甚密。魏、杜二人与杨时常恳谈，与他交换了对中国社会、对当时的政治形势以及对国民革命的前途、道路等重大问题的基本看法，魏还向杨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基础理论。这些使杨虎城深受启发，其政治视野大为扩展，对于他其后的思想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一大召开，孙中山先生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这使杨虎城深受鼓舞，这与他在陕北时期所形成的一些思想认识是基本一致的，从而更坚定了他的这些新的信念。也是在这次会议中，孙中山亲自为杨虎城办了加入中国国民党的正式手续。次年，杨率部从陕北南下，并成为在陕西首倡国共合作的国民党人之一。此

后，他与共产党领导的群众运动配合，驱逐了北洋系的陕西督军吴新田，一时，陕西的革命形势为之高涨。

北洋军阀决不甘心轻易地失去西北，同时为平靖后方以全力对付广东政府即将发动的北伐，一九二六年春派刘镇华率十万镇嵩军直扑关中。刘曾统治陕西多年，人民已受其祸不浅，而镇嵩军又纯靠烧杀抢掠就地征发军费，为祸更烈。其来势汹汹，很快就进逼西安城下。于是关中地区人民为免遭涂炭，纷纷要求保卫西安。此时西安城中仅有刚被北洋军阀击溃的国民二军李云龙部二千多人，及陕军卫定一部二千多人，这两支部队也正准备撤离。各界人民便推举代表前往杨虎城驻军的三原，要求杨派兵守城。而杨部也只能抽出五千多人，以三支拼凑起来不足万人的队伍抵挡十万镇嵩军，且毫无援军可盼，权衡之下谁也难以抱乐观之想。在这种关头，杨虎城再度表现出慷慨赴义的无畏气概，他毫无迟疑，亲自率五千人进入了孤城西安。进城之日他赋诗云：“万

姓倒悬我心忧，满地烽烟何日收？联合民众撑危局，扫尽群魔定神州”。这很可以表明他此时的抱负和信念。

杨虎城进城后采取了一系列军政措施：统一了三支不同部队的建制；推举李云龙为总司令，他自任副职；以友军负责压力较小的西、南方面，他的部队则担任敌人主攻方向的防御；与共产党密切合作，加强政治工作，充分发动和团结全体人民作为这场战争的后盾。从这些正确的措施可以看出，杨虎城颇有以大局为重的政治家的胸怀和韬略。当时，杨母尚住在敌人控制下的蒲城，为防止敌人借此要挟，杨传令三军，不准任何人哪怕是向他提及他母亲的情况，违者杀无赦。广大将士从中看到了主帅的决心，极大地激励了斗志。尽管守城的战斗异常残酷，两军曾多次白刃肉搏，阵地有时几易其手，而镇嵩军始终未能攻入西安城。

由于刘镇华从一开始就断绝了西安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加之城中还增加了数万避敌而来的群众，因此西安不久就面临着食粮匮乏以

及弹药不足的困难。敌人借此展开了和平诱降的攻势，同时城中的一些绅士等也大肆活动主张投降。在极端困苦的条件下，杨虎城毫不动摇，他采取了一切可能的办法缓解困难，同时宣称：我们抗击刘镇华，就是直接打击北洋军阀，也就是协助革命军北伐。我们坚守西安也是为西北革命争人格，一定要坚守到底，倘万一城破，我就自戕于钟楼。正是这铁一般的意志稳定了军心，使全城军民同仇敌忾，浴血奋战，终于在友军的帮助下，取得了最终的胜利，援应了北伐。

坚守西安孤城的战役持续了八个月之久，城中的鼠、雀以至一切可资果腹的东西都被罗掘殆尽，士兵们在作战中也不得不借助弓箭、石块等原始武器来弥补弹药的不足。八个月里，军民牺牲者逾万，三秦健儿的强韧精神可谓发挥到了极点，而这当中，杨虎城则起到了灵魂的作用。这场战争，对杨虎城也是一次极大的磨练，他从中充分体验到人民群众的力量所在，没有人民的全力支持，胜利简直是无

法想象的。同时，共产党人英勇卓绝的斗争精神和出色的政治工作也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坚守西安直至胜利，也反映了杨虎城思想品格上的一些特点。可以看出，在局势动荡中，他能够顺应民意和潮流而行事，在重大历史关头，他唯其信念而非以个人利害为准绳；在与友军合作时，他能够顾全大局，不争名利，维护与友军的团结。而且，他刚毅果决、不甘屈服的强悍性格在这过程中也表露无遗，表明他是一个敢于把事情干到底的人。杨虎城的这些政治品格在尔后的西安事变中得到更充分的表现，铺叙这段历史，对于理解他在西安事变前后的所作所为无疑是有益的。

波澜壮阔的大革命以辛亥革命所未有的深度涤荡着社会，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和土豪劣绅的纲领口号得到全国民众的衷心拥护，群众真正地被发动了起来，人们开始尝试到作为“人”的平等权利。代表劳苦工农大众的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革命运动的前列，推动社会的变革一步步走向深入。这一切给予杨虎城以深

切而清新的感受。一九二七年五月，他挥师东出潼关参加了北伐。但这时，第一次国共合作已开始破裂，国民党各部队先后清党，屠杀共产党人。杨虎城的亲身体验使他对这种背弃孙中山三大政策的行为十分不满，拒绝去执行清党的命令，而表示要与共产党合作到底。因而，许多在它处已无法立足的较著名的共产党员，如魏野畴、南汉宸、蒋听松等人先后来到杨的部队，在当时全国处于白色恐怖的情况下，杨部所驻的皖北地区却出现了国共合作的局部高潮。一九二七年底，杨虎城向魏野畴等为首的中共皖北特别委员会正式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这足以表明他此时已把变革中国社会、拯救民众的希望寄托于共产党，并愿意在逆境中与之同舟共济，他这种对信念的执著和真诚的追求不能不说是难能可贵的。由于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内“左”倾指导思想已逐渐占居主导地位，而错误地推行关门主义的作法，杨的这一愿望并未能成为现实。不过这段密切合作的经历，却为尔后他与共产党人

保持长期友谊奠定了基础。

不久,在种种因素作用下,杨虎城离开部队前往南京、上海。中共皖北特委发动了暴动,但很快失败,杨引为挚友的魏野畴壮烈牺牲。杨虎城十分悲痛,无心再回部队而泛舟东渡。在日本的半年多时间,杨开始接触到一些当代西方的政治思想,并第一次体验到了什么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有一点给他感受很深,虽然当时的日本政府已开始走向法西斯主义,却还允许马克思、列宁等人的著作公开发行,法律也并不禁止共产党的活动。而在当时的中国,却连这样的一点民主形式也没有,相形之下,杨虎城更感到变革中国社会的必要。他在日本的另一重要收获就是通过了解日本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和全面走向军国主义的趋向,得出日本必然发动侵华战争的结论。可以说,他日后积极倡导抗日救国与此思想认识有着密切的联系。

一九二八年底,杨的部队在山东面临绝境,杨虎城不得不启程回国。在此两年的时间

里，为了这支部队的生存，他率领部下在蒋、阎、冯、桂等几大势力的混战中寻求自己的出路，并为蒋介石的“统一”屡立战功。因此，一九三〇年底，他以十七路军总指挥的身份受命陕西省政府主席之职，次年又就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从此，杨虎城也就由一个纯粹的军事将领变成了一个在地方举足轻重的军政首领。

杨虎城自接手陕西政权后，便开始筹划实施他的政治抱负。他深知自己的杂牌地位，并很清楚地看到蒋介石任命他作陕西省主席，是因为其嫡系中缺乏合适的人选而又要稳定西北的无奈之举。更重要的是他绝不赞成蒋介石的基本政治立场及其一系列政策和作法，因此，他以南汉宸、杜斌丞为他的重要谋士，共同制定了打通甘、新，背靠苏联，实施民主，联共反蒋的战略，有人称之为“大西北主义”。一九三一年底，北洋军阀吴佩孚招揽残部在甘肃成立中国国防军。杨虎城借机派兵攻占了甘肃。但蒋介石决不能容忍杨虎城势力的扩张，他否定了杨举荐的人选而以邵力子为甘肃省

政府主席，随后，他派胡宗南进驻甘肃天水，迫杨将部队撤回陕西。杨虎城还曾作过几次打通西北、脱离蒋介石控制的尝试，然而也都未能成功。因此，杨虎城只能在蒋介石的控制下，进行一点局部的改良而已。其中值得记叙的有下列几端：“一、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倡导学术自由。”“二、振兴地方经济、促进西北建设”。“三、强烈的民族意识，伟大的爱国热忱。”“四、开明的政治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杨虎城就任陕西省主席之后，立即保荐南汉宸作了省政府的秘书长。一个国民党的封疆大吏敢于如此重用一個知名的共产党人作他的幕僚长。不仅需要勇气也需要开明的政治气度。也说明杨虎城自皖北合作失败之后，尽管他对中国共产党这一时期的许多作法不满或不理解，但始终认定中国革命的前途非共产党莫属，对共产主义者的崇高理想和英勇斗争精神仍抱景仰之情。并对共产党人持以友好的态度。他从日本回国后，先后收留了许多大革命失散了组织联系的共产党员，如与他同时遇难

的西北文化日报社社长宋绮云、在抗日战争中壮烈殉国的国民党九十六军军长武士敏，曾在南昌起义中担任叶挺师政治部主任的陈兴霖以及他的机要秘书王菊人等，他还从南京监狱中保释了共产党员王泰吉，请来曾被羁押的共产党员张汉民，后来分别授予团长和旅长的兵权。杨虎城进入陕西后，第一件事便是释放一切在押的政治犯，并资助其中一些人出国留学。在决定省政府等机构的人选时，他采取了以才干取人，不问政治派别，也不依据乡土观念的豁达态度。因而在杨的部下中，始终存在着一批担任要职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以及许多外省籍的知识分子。一九三三年，红四方面军转移到川陕边境一带，经杨的中共地下组织斡旋，杨虎城主动派人与红四方面军取得联系，并订立了反蒋抗日、互不侵犯的口头协定。这是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五年间，国共两党的部队唯一成功的合作。当然，杨虎城的开明政治无法脱离当时中国的历史条件，虽然他无意剿共，而且下令释放过被所部骑兵旅逮捕

的陕北红军主要领导人刘志丹，还为红军提供过武器、药品等，而却又不可能被迫参与一些剿共战争。但无论如何，杨虎城不抱党派成见的政治意识、与共产党的长期友好交往以及强烈的抗日要求，无疑是使他成为最早接受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的国民党重要将领的历史渊源。

杨虎城在上述方面的思想见解和作法，也必然导致他与蒋介石矛盾的加深以致激化。如前所述，蒋介石把陕西交给杨虎城不过是出于一时的权宜之计，也从未真正对杨信任和放心过。他对杨及十七路军采取了政治压迫、军事威胁、特务监视、分化收买其部下、肢解其部队等各种手段。尤其是在一九三三年，蒋介石强力逼走杨的秘书长南汉宸，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撤掉了杨的省政府主席一职，明显表露出其消灭异己的意向，从而使双方政治见解的分歧发展到相互关系的急剧恶化。可以说，至西安事变前，杨对蒋的信任感已丧失殆尽。顺带补充一点，因为杨虎城对地方行政权力的丧失，